

20世纪

贾新民 主编

中国大事年表

(1900—1988)



20 世纪 中国大事年表

(1900—1988)

贾新民 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156号

20世纪中国大事年表

(1900—1988)

贾新民 主编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郊海淀路39号 邮码100872)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北京鼓楼西大石桥胡同61号)
新华书店经销

•

开本: 850×1168毫米32开 印张: 19插页5
1992年10月第1版 1992年10月第1次印刷
字数: 474 000 册数: 1-5 000

•

ISBN 7-300-01280-9
C·92 定价: 12.00元

主 编

贾 新 民

撰写人名单

政治类:	顾 听	贾新民	林 甦
经济类:	贺耀敏		
军事类:	董国政		
法律类:	米万英		
外交类:	何茂春	师晓霞	
文化学术类:	贾新民	杨念群	董纪平
	方 鸣	张东东	筱 琳
文学艺术类:	梁晓燕	薛 勇	韩忠恩
	曲锦春	陈卫和	冯双白 高 鉴
科技类:	樊洪业	李真真	
社会类:	吴廷嘉	郭 芳	
教育类:	杨东平		
生态人口类:	田 明		
港澳台类:	陈思训		
体育卫生类:	胡贵增	郑继圣	王振坤

用历史的眼光理解当代

——序《20 世纪中国大事年表》

贾新民

(一)

近年来,以“大事记”、“年表”、辞书形式出版的现、当代史学工具书、资料书已越来越多,这是件好事。它至少反映了人们一种超越意识的发蒙与觉醒,也就是说,人们为着懂得自己所生活的时代,经过反复的探索、解读,乃至试错式的实践之后,终于发现,当代人在切入当代问题时,始终摆脱不掉一种几乎难以避免的局限性与主观性的干扰。用史的眼光、史的心态、史的精神切入当代问题,正是人们力图克服由这种同时性带来的局限性与狭隘性,从而获得对自己及自己所处时代的更逼近实质理解的一种尝试性努力。说它是好事,正在于它表达了人们对自己有限性的永不屈服的抗争,以及对自己盲目性的一种反思性意识,——它表达了一种人的自觉。

当然,20 世纪的史学哲学(也即史学自我反思)的一个重要成果,即是对历史学主体性的肯定。它意味着人们对历史的任何重现与阐释,从绝对的意义讲,主观性是难以被真正地剔除的——介入

历史,人总有一种不自觉的对历史的预期;阐释历史,人总有一种使历史便于我们使用分析工具的偏好,所有这些,都使历史的叙述与阐释,程度不同地带有了撰写者、历史表达者所处时代的印迹,也即是使历史表现出了明显的当代性与主观性。但是,我以为值得特别强调的是,在一段时间里所有的这一切,如同 20 世纪一切对现代文明反思性哲学在庸人们那里的命运一样,它被毫无顾忌地当成了根本取消理性与学术规范的依据与口实。

毫无疑问,20 世纪的史学发生了一次实实在在的革命,但这种由史学哲学开始的革命,绝不意味着对历史相对主义的简单肯定,更不意味着对历史主观任意性无条件的容忍与放纵。它造成了史学在前所未有的意义上的解放,但这一解放运动本身,带来的是历史表述权力大众化的倾向,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即是社会史地位的提升及与此相关的口述史的兴起与发展。它使历史的叙述,不再仅仅是史官与史学家的专利,使历史内容本身,也不再仅仅是由特定身份、特定阶层人们所制造的特定事件所独占与充斥,这就使得历史变成为所有阶层的所有人们都有权依照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特定处境的特定感受与体察,对各自经历的时代进行多层面、多视角、多重价值标准的平等表达。从而使这一新的史学哲学通过破除传统史学观中对客观性理解的迷信,而带来了使历史的重现更逼近客观性的结果,也即带来了史学从特定阶层的主观性中的相当大程度的解放,使历史更加贴近了历史的原貌!

历史叙述的主观性确实是迄今尚难根本摆脱的难题。但是,历史学精神的真髓却在于追求客观性,力图克服主观性是历史学本质性的品格与灵魂,它对自己主观性的毫不懈怠的警觉与揭示,正是它能够不断突破被前人认定的极限与禁区,向着客观性这一永恒的彼岸最大限度的逼近,成为其永不衰竭的动力与保证。这样一种精神渗透进史学研究的规范、方法、原则之中,从而使它的价值与有效性便可能远远超出历史研究本身。正是基于对包括当代史

学哲学在内的史学精神的这样一种理解,我们才可以断言,人们把史学精神与规范引入对当代问题的理解与把握,它所表达的才是当代人自我指向、自我追问、自我理解这样一种超越意识的觉醒。而也正是史学的目光由对以往时代的追忆转向对当代问题的观照,它也就必将成为当代人自我升华与超脱,从而大大深化对自己时代的自觉,从而使我们在一个激烈变革的时代,在时时面临的决定我们处境与命运的选择面前,牢牢地占有着清醒与理性的资源与保证——变革使历史感对变革时代的人们极富价值。淹没在目不暇接的历史大事件中寻求历史感及其所代表的理性,应当说,这正是我们决定编撰这部世纪规模的作品动机与追求之真意。

(二)

编撰这部《20 世纪中国大事年表》,我们从始至终争论不休的问题就是“何谓大事”。

整个 20 世纪,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都始终处在波澜跌宕、风云翻滚的变革之中,处在这样的时代,历史似乎每天都在进行着对未来具有极大规定性的选择。一些当时似乎光彩夺目的事件转瞬之间即会变得黯然失色,而另一些事件刚刚被历史风尘所遮盖,让人们认为它已失去了昔日人们曾以为的价值,但戏剧性出现的新的事变,却又在新的层面、高度上重新唤起了人们对它的记忆与追问。编“大事年表”,我们的一个深切苦恼,就是如何能够找到一条准绳,帮助我们从这不胜其多、多得令人窒息的事件中解脱出来。为此,除了基础性文献、资料、专著之外,我们用了很大的功夫去比较与研究我们所能收集到的已出版的同类作品,希望能从别人的框架、依据、标准中获得启示。但是,我们很快发现,除去孤立地依专史分类也即以专史各自的尺度独立地筛选各自领域的事件之

外,绝大多数这类的出版物,都是有意无意地遵循政治中心原则,也即以政治重要性作为评价指标。政治事件在构成比例上占据了绝对大的分量,而且,即使是非政治事件的选择,也在相当大程度上遵循着其与政治相关程度强弱来决定取舍。这当然是有道理的,起码对中国,政治是充斥 20 世纪始终的主题。生活在 20 世纪,勿宁说是生活在政治角逐的旋涡之中。这一点,即使在我们的《年表》中也当然必须如实地表达。但是,如果我们也依同样的标准进行选编,则除去拾遗补缺、进行更缜密的核校或对某些侧重点进行某种调整之外,我们并不认为还有重复劳动的必要。而且,更重要的是,在我们看来,依政治为主线进行历史清理价值虽然自不待言,但是,它与我们历史反省的初衷、我们介入历史的期待还有某种距离。

就我们而言,我们始终觉得,正如一切变革时代一样,从历史的最表层看去,政治似乎是有价值的历史的全部内容,因为它是那样直观地表现为决定着历史的走向与命运的动因。但是,正如一切稍有历史修养和常识的人们都会理解的,历史的命运与现状的真正依据,却未必尽能在政治层面上得到解释,进而政治本身,也有着较之它更为深刻和复杂的机制、因素在规定着它的选择。理解历史,我们的兴趣恰正在穿透历史的直观性,去看到一个更为丰富和内在的世界。正是在这样一种共识下,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终于认定,真正使得 20 世纪在中国历史上显示出特色的,是早在上一世纪后半叶即已开始的现代化追求,——它不仅涵盖了本世纪历史运动的所有领域,而且使得这些在传统社会中彼此之间相对分离的领域之间也发生了错综复杂的互动,变成了界线相当模糊的整体过程。20 世纪,现代化才是贯穿所有历史运动始终不变的主题,即使在许多情况下,它是以反现代化的形式呈现给我们的。于是,现代化,便成为我们把握和统领 20 世纪历史的纲,成为我们理解和选择历史事件所遵从的依据。

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在上世纪末提上了日程,尽管人们习惯而自信地将现代化运动中各种不同的历史态度与主张分别冠上了保守的、改良的、激进的标识;但是严格说来,在所有这些人中间,在对待现代化这一总趋势的态度上,本来并不存在一种绝对不可化约的对立。我以为,他们中一个真正的差别在于,对现代化是功利的认可,还是价值的认可。问题是由于现代化对中国,如同对于一切非西方的前现代化民族一样,它的出路是缺乏来自民族历史的亦或民族文化的依据。这就是说,现代化在中国是缺乏现成的支持资源的,仅仅就此而言,中国与一切希图完成现代化转型的民族、甚至包括西方民族在内的并没有实质性的差异。中国与西方,甚至与一切前现代化民族的真正差异在于,中国的现代化是开始于传统的社会、文化,即使不发生外来文化冲击,也已陷入了十分深刻的危机之中。这种严重的内在危机,在外来文化冲击面前,只是变得更加激烈和尖锐而已。为着防止社会在严重民族危机面前发生进一步的崩溃,对传统价值进行绝不通融的辩护,便成为功利派舍此无他的选择。而面对传统社会结构与文化日益衰败,价值派失去了任何信心,不遗余力地扫荡传统价值的影响,以外来文化取而代之为创造前提便成为他们启动中国现代化的津要所在。把文化当作护国或现代化的决定性因素不自觉的共同预设,决定了中国现代化不同取向的分歧变得不可调和。这种本来相当程度上只表现为相对性的对立,无论是在面对本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态度时,还是在具体选择现代化的途径与评价具体的历史运动的性质时,这种对立与分歧都表现出了极其难以通融的绝对性。它表现在贯穿于整个世纪的中学与西学、传统与现代、本土化与原教旨的无休止的理论论争之中。

与此类似,在为着民族功利主义目标而选择的通过权威主义政治秩序、社会结构的建立,最大限度地利用权力强行集中稀缺资源实现工业化的道路方面,不仅一般地造成了社会结构二元化的

不断深化,而且,一方面由于农村有限剩余被过分地剥夺而大大加速了农村的破产,剩余人口迅速增加;而另一方面,在外国资本的压力下步履维艰的新兴城市工业,不仅无力为农村人口转移提供机会,而且由于它们同时被迫承担了支持权威中心维系的主要压力,因而自身的维系也时时受到多重的威胁。利益的冲突与利益意识的觉醒,以及现代化过程中社会动员的深化,使来自边缘的参与要求不断强化。在社会动员、分化程度与制度对参与容纳弹性之间失去平衡的情况下,所有的问题便自然地变成选择新中心象征、新权力中心、新中心制度的问题,所有分散在各个领域的问题,也便失去了在局部范围内解决的可能,只有这时,只有在所有问题都必须政治地解决的时候,政治在中国现当代史上中心地位,才被合理地肯定了下来。而也只有当着现代化运动兴起时,一直处于现代化中心的政治势力、政治精英集团本来是为着现代化才被肯定的权威主义努力,由于已经在相当大程度上陷入了盲目的或纯粹无休止的权力之争,因而共同地失去了道义的依据,失去了创造新的文化中心象征的热情与动力,而原来本该处于现代化边缘、死角的力量才获得了用“消灭阶级”的名义扫荡一切导致社会冲突的政治势力。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为中国历史找到了一条解开死结的活路。于是社会统一了,对抗起码暂时缓解了,社会从无休止、无结果的对抗中解脱了出来,开始向着它初始的预期实实在在地跨越了一步。一些最基本的冲突,虽然并未就此了结,但是,应当肯定的是,它是在一个新的水平上,新的高度与起点上展开的。

这即是波澜壮阔的中国现当代史或现代历史的基本线索。把握了现代化这样一条基本线索,虽然从形式上看,我们面对的历史规模更加扩展了,但是,它却使我们有可能获得一个把整个世纪的历史真正当作一个具有统一内在依据的整体来观察的视角。于是,虽然在我们的这部年表中,政治如同历史事实一样,仍然不能不占

据主要的位置,但在与其他领域的关系性质上却有着不尽相同的特点。文化(包括学术、思想、文学、艺术等等)、经济、社会领域的比重相对而言要大一些。世纪的与民族的整体性要强一些。它虽然不意味我们最后的成稿真正能如我们所愿,但起码在坚定我们把这部工具书编成、编好的热情与信心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我们明确地向读者说明这一意图,目的不仅在于导读,而且在于吸引读者以挑剔、批评的眼光对我们选择这样一种切入方式的合理性,对即使依这一原则去评价它,对它所必然存在的疏漏不足以揭示与批评。我想,如果真能如此,这本身就不啻为一种对世纪历史的现代化反思,其意义远超过了我们自己在批评中所能获得的教益。

(三)

这部工具书,严格讲,应当说是我们真正投入力量编撰的《20 世纪中国大事典》的副产品。所以在耗神耗力的辞书编撰之余又编这部年表,用意在两点:一是“大事典”本身是一部 300 多万字的辞书,要想让它普及,对读者在经济上、精力上、知识上都有它本身具有的要求。这部只是“大事典”十分之一强规模的简本,是否可以弥补此一缺憾,虽然我们还不得而知,但却是我们的苦心所在。二是在编撰“大事典”过程中我们发现,辞书条目的选择,与一般大事记、年表事件选择标准并不总是一致的。辞书重在释义,即选在大事典中的辞条,不仅必须满足重要性的要求,而且同时必须是具有阐释必要的事件。没有特别阐释意义的事件列入大事典,勉强阐释,往往显得画蛇添足,故弄玄虚。但是,如果将没有特别阐释价值的事件尽行删尽,历史本身的许多重要连接、历史本身的不管在怎样层次上都必须具有的丰富性都会被伤害,从而影响人们对它的更为贴切的把握。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理解,我们在淘汰掉按我们的

标准不够入选的事件、不适合“大事典”特点与要求的条目之后，决定编撰目前这部年表。我们是试图用它来弥补“大事典”本身的不足，期望能为历史的完整表达找到一个更为方便的形式。由于我们选事的起点是从编辞书开始的。年表只是辞书的扩展与延伸，因此，这就决定了我们的年表，不同于一开始就以年表的标准介入历史，这不仅会使我们对历史表达的细致程度可能不同于已经出版的年表，而且按我们选事下限的尺度，在同一层次上顾此失彼的现象肯定会有。由于精力，我们只好把这部分工作留待今后完成。

作为《20 世纪中国大事年表》，我们目前只清理至 1988 年，离本世纪结束，还有九年，我们年表涵盖的空缺，还有十一年。不管是由我们，还是由其他人填补此一空白，总还会有机会对已经编入的部分进行重新审定，但愿到那时，这部分的缺憾能够得到完满的处理和补充。

(四)

这部年表和将要出版的“大事典”的编撰工作，从启动到中间的运行，第一驱动力都是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他们在整个工作中提供的多方面支持和协作，应该说是该书今天能够出版的决定性因素。从此一工作开始筹备，即得到该社总编李淮春教授、副总编周文柏编审、邱金利副社长的热情鼓励。在整个编撰组织、审稿、工作协调方面，周文柏同志做了大量的实际和令人鼓舞的工作。所有参加该书编撰的同事，尤其是作为该书主编的笔者本人，都高度评价了人大出版社综合编辑室的费小琳同志的工作。她不仅为在编撰者与出版社之间，在各编撰者之间进行联络协调方面作了大量辛勤琐碎的工作；而且在收集资料、审核史实、整编等方面，主动作了许多工作，在相当大程度上，我和我的同事们毫不夸

张地认为,没有她的努力,这部即将出版的“大事年表”付梓出版几乎难以想象。在本书留下他们的名字,似乎是我们可用来表达谢忱的唯一得体的方式。

(五)

我们在不知不觉间已经走到了世纪的交结点上了,尽管这种人为的时间标定,并不总意味着与历史内容、历史时代是重合的。但是,它习惯上,总会给人一种昔者已逝之感,总会让人产生一种新的期待。在即将结束的一个时代中去反思一个时代,尽管历史局限性是难免的,但它总是一代人的责任。尽管我们提供的只是一部资料性、工具性的作品,它本身还只是为自觉到反思责任的人们做一点辅助性、基础性的工作。但是,事件选择本身也总会反映出我们对历史不自觉地反思的水平 and 程度。尽管我们在前面已经说到,用史的眼光、史的态度观察当代,它本身即是一种对自我超越的追求,但它的极限(更遑论由我们个人水平决定的极限还远远达不到历史本来允许的程度)是明显的。真正能够评价本世纪的,是将要跨入新世纪的人们,但是可以对本书提出批评的,却完全可以是本书编撰者的同代人。我们期待着回声。那样,或许就在 20 世纪,我们即可以将我们的历史搞得更清楚、更深刻;我们在接受下个世纪人们的评点的时候,事实上,我们已为他们铺垫了更高的立足点,使他们因为我们对超越的意识与追求而获得更多的补益。这或许是我们和将要出现的批评者们的工作意义或历史责任的真正所在吧!

1991 年 8 月 30 日

于北京三里河陋室

凡 例

一、本书收选了 1900—1988 年间大陆与港台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法律、文化学术、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生态人口、社会生活、体育卫生各类的重要事件、重要人物。

二、本书按时间顺序排列，使用公元纪年。事件一般精确到“日”，无法精确到“日”的事件列在月末，无法精确到“月”的事件列在年末。

三、事件叙述详略以其重要性、复杂性为准。我们以其对现代化运动正负影响程度做为评价重要性的依据，兼及各具体领域中事件影响的深度和广度，尤其侧重文化学术、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体育卫生这样一些对民族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事件。

四、人物条目以其去世时间列条。故只收已故历史人物，不代表对本世纪所有重要人物的评价选择。

五、本书所依据的资料均为 1991 年以前的公开出版物。大量参阅已出版的同时期的史学年表、编年史、事典、通史、回忆录、部分人物传记，以及近年来公布的党史、国史、档案资料。

六、本书所出现的古地名都在文中注今名。外国人名译名一般采用通行译名。

七、凡出现文件、条约、事件等名称时，均使用全称，并在括号

内注明简称或通行称谓。

八、遇事件发生时间、地点、称谓有几种说法时,我们一般参考几种版本,选择较权威或采用较多的一种,并注意使本书所使用的时间、地点、概念等都有至少一个以上的出处。

九、本书遵从工具书价值中立的原则,无论事件、人物的记述概不使用具有褒贬倾向的语词。

十、本书为《20 世纪中国大事典》(人大版)的副本,参考书目、各类附表、条目索引等编撰于《大事典》中。

1991 年 10 月

目 录

1900 年	1—4
1901 年	5—8
1902 年	9—12
1903 年	13—16
1904 年	17—19
1905 年	20—22
1906 年	23—27
1907 年	28—32
1908 年	33—35
1909 年	36—39
1910 年	40—42
1911 年	43—46
1912 年	47—52
1913 年	53—57
1914 年	58—62
1915 年	63—66
1916 年	67—71
1917 年	72—75

1918 年	76—79
1919 年	80—87
1920 年	88—92
1921 年	93—97
1922 年	98—103
1923 年	104—109
1924 年	110—114
1925 年	115—120
1926 年	121—125
1927 年	126—132
1928 年	133—140
1929 年	141—146
1930 年	147—153
1931 年	154—161
1932 年	162—167
1933 年	168—173
1934 年	174—179
1935 年	180—187
1936 年	188—196
1937 年	197—206
1938 年	207—214
1939 年	215—219
1940 年	220—224
1941 年	225—228
1942 年	229—233
1943 年	234—239
1944 年	240—243
1945 年	244—252